

# 党史资料参考

## 第一辑

革命回忆录选编之一

中共扬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

一九八二年九月

## 前 言

为推动我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并为编写革命斗争史正本提供素材，我们编印了这份《党史资料参考》。它是一个内部的、不定期的资料汇编，着重编印一些反映本地区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录、座谈纪要和专题回忆。目的在于：1、通过发表这类文字，广泛征询各方意见，搞清存疑问题，求真存实，立准史料；2、理清本地区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组织发展脉络，搞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、地点、有关人物和这些事件的发生、发展及影响；3、为老同志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园地，从而通过各抒己见，秉笔直书，帮助我们在总结全区党的历史经验时立准观点、提供论据。

八年抗战，三年解放战争，扬州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。这段历史，叱咤风云，鬼泣神惊，其间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和英勇悲壮的斗争场景。全面地、生动地、准确地反映这一历史生活，是我们的责任。但由于当年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，很多

重要史料，严重散佚，给我们今天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。于是，组织老同志撰写回忆录和座谈斗争大事，也就成为我们征集党史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。我们编印它，既是为了保存资料，也是为了通过发表一些文章，起个触类旁通的作用，以之启发更多的老同志的联想，使他们把埋藏多年的记忆挖掘出来，变为向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。当然，这些文章，因为回忆者当时所处的位置，他们的阅历和认识水平不同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细节上的差异，加上往事已久，也很难求全，但可以相信，这些差异和不足，是能够通过讨论求得一致和充实的。因此，《党史资料参考》所发表的文章，在未作订正前，只供参考，不得对外引用。

《党史资料参考》计划按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的进程组织文章，选择编印，以求比较系统地反映党在我区领导两次战争的活动和斗争。我们希望全区各县（市）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和参加过我区革命斗争的老同志，积极向我们提供资料和线索，帮助我们办好它。

**编 者**

1982年9月15日

# 目 录

抗日战争时期的太州党组织…… 戴为然（1）

怀念刘伯厚先生…………… 杜干全 遗作（6）

抗战爆发前后我在太兴等地

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…………… 黄云祥（16）

城黄线围点打援记实…………… 赵 容（41）

# 抗日战争时期的泰州党组织

戴 为 然

“七七”芦沟桥事变后，泰州进步青年积极投入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，努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，建立“泰县（民国初，泰州改称泰县，解放后又称泰州）文化界抗战工作团”、“抗日剧社”等救亡团体，在城市、在农村宣传抗日救国道理，唤起民众，自卫抗日。一九三八年，上级党组织派俞铭璜同志来到泰州，和当时的“泰县文化界抗战工作团”接触，传播革命真理，开展党的活动。

一九三九年春，俞铭璜同志发展抗战工作团成员张雷平（原名：邵泽甫）盛坚夫、黄克孚（原名：黄钟、黄成玺、黄节）、李健（原名李玉琴）和我五人入党，宣誓地点是在泰州城里偏僻的荻柴巷内的王择生家中。从此，建立了“中共泰县工作委员会”，俞铭璜同志为

书记，张雷平同志为组织部长，我为宣传部长。

泰州地下县委成立后，积极开展了四个方面的工作：（一）宣传革命道理。地下党组织利用“抗战工作团”名义，经常在我们桥南的天主教堂门前等地演出“放下你的鞭子”等剧目，有时也到姜埭去演出。同时，还从沿长江边的各个游击队筹集了五百元资金，创办“苏北书报社”，通过城内“新泰书店”代销上海出版的《译报》周刊、《西行漫记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等马列著作以及《华美晚报》、《新四军言论集》、《项英言论集》等。除此还有上海出版的《解放》周刊，只有二十份，对外不出售，留给党内和团结在党周围可靠的非党同志看，（曾收藏在交通银行的金库里）地下县委也曾翻印过毛主席《论持久战》和《论新阶段》等著作。（二）输送革命力量。泰州地下党组织当时还不断选派不少店员、小知识分子到皖南、扬中、吴家桥和郭村我党我军的学校训练班去训练，培养干部，如地下党员（伪泰县保安队排长）姜兆宜同志，就是由组织上介绍他到新四军教导队去学习，后来留在部队的。东进回来后，他已

当了连营干部，不幸在一九四〇年九月的姜埝战斗中牺牲。（三）发展党组织。地下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，不断培养积极分子，物色建党对象，当时不但在城里发展，而且还向里下河的东汴头、叶甸、苍仓，以及东南乡白马荡，还有姜埝、白米、曲塘、海安一带农村发展，以后党组织还扩大到兴化、宝应的部分地区。

（四）配合新四军作战，例如泰州九里沟面粉厂地下党支部，他们号召工人努力生产，为新四军东进抗日提供了大量面粉。又如姜埝地下党，他们在新四军攻打姜埝时放起一把火策应。

一九三九年初冬，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，通缉我和俞铭璜等同志。我们安全转移后，党派陈扬同志接任地下党县委书记。黄桥决战后，新四军在苏北开辟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，泰县公开建立了苏北第一个红色政权，惠浴宇同志任县委书记兼县长，机关驻泰县海安镇。一九四一年二月，李长江投降日寇，日寇于三、四月间占领了海安。此时，泰县县委就转至农村的雅周庄，辖通扬运河以南的雅周、蒋垛、姜南、张甸、塘湾五个区，直属苏中区党委领导，不久之后，划归到三分区。

在此期间，敌占区泰州只有一个地下党支部。为了开展工作，公开县委即派王向明（原名王赓祖）同志进城为地下党负责人。一九四一年九月，苏中区党委又派杨源时同志任中共泰州地下秘密县委书记，驻泰州北乡周庄。李进（原名李硕诚）同志分管泰州、姜埭地下党工作。王向明同志分管塘湾兼与新四军公开县委联系。当时秘密县委的任务有三个：

（一）到李长江和陈泰运控制的敌占区发展党组织；

（二）搜集情报，即搜集李长江、陈才福、陈泰运及日本宪兵的分布、兵力调动和军事力量等情况。

（三）决定发展泰州东北地区的武装组织，准备建立革命根据地。

一九四一年夏，公开的泰县县委书记惠浴宇同志调至一分区任专员，后来继续任县委书记的是许家屯、徐克祥、曾如清、张孤梅、汪海粟、周文在、彭冲等同志。

一九四三年九月，泰县全县的党，已有城区、雅周区、大埭区、蒋垛区、海南区、曲南区、塘湾区、张甸区、姜南区、交通支站等组

织，共有支部六十三个，县、区、乡级干部二百五十三人，党员总数达九百五十四人。

1979年3月于南京

# 怀念刘伯厚先生

杜干全遗作

一九四一年初，黄桥为敌占领。苏中三分区的大块根据地沦为游击区。泰兴县各区随时有遭日伪袭击的可能，形势紧迫。抗日民主政府泰兴县县长张颐吓破了胆，私自潜逃至伪军据点唐湾镇，与地主女儿成亲去了。有的干部在他的影响下，也跑回家中，坐观局势的发展。

当时，中心县委书记韦一平同志亲自带领县警卫大队（后扩大为县团）在泰兴路南一带活动，打击入侵的敌人。这时，我刚调来泰兴任县长，他要我也学会打游击战，更好地保卫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。还提出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，广泛团结党外进步人士，以共同对敌。我们同县委负责同志常足斋、黄云祥和四区区长栾长明等一起商量，选择统战对象中的

代表人士，共同决定请刘伯厚先生筹备泰兴县参政会和泰兴乡村师范，从民意机关和教育方面来支持、协助党和政府的各项抗日民主工作。

伯厚先生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同共产党合作过，对我党有所认识。新四军东进以后，他看到新四军确是坚决抗日和爱护人民的好部队，对不少革命同志表示钦佩，特别是对陈毅同志非常敬重。他说陈毅同志是文武全才、大将风度、虚怀若谷、平易近人。还有，伯厚先生为人刚直不阿，教学严肃认真，在泰兴县可以算是桃李遍地的一位老教育家。

记得那是一九四一年的二月，我和栾长明同志冒着严寒，身上穿着棉袍，藏着短枪，（因为当时伪军时常到曲霞镇上来活动）前去探望他老人家。当我们到达博罗中学时，他正在上教学课，我们一直等到他上完课才见了面。说明来意后，他没有被当时的险恶环境所吓倒，当场答应了我们的要求。但谦虚地说：才德均不能胜此重任，但愿和大家一起搞抗日民主工作。

同年四月，叶飞同志率领新四军两个主力

团在姚家岱消灭了鬼子一个排，其中生俘三人；伪军数百人闻风逃窜。这次战斗取得了反“扫荡”的重大胜利，使鬼子和伪军吓破了胆，龟缩在据点里一时不敢进行报复性的扫荡。叶飞同志针对这种形势，要县委开展减租减息，保卫夏收，扩大和巩固根据地。县委认真执行了这一指示，广泛发动群众减租减息，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，健全了党群组织和游击队组织，并结合整顿了乡政权，在此基础上，经请示苏中三地委和三专署同意，召开了泰兴县第一次参政会，会上朱专员克靖同志做了形势报告，通过了减租减息的具体措施，伯厚先生当选为参议长，黄云祥同志当选为副参议长，还选出若干名驻会委员。

以伯厚先生为首的参政会，对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工作都作了十分认真的讨论。我们也很尊重他们的意见。凡是县委和县政府提出的重大措施，都事先征求参政会及驻委会的意见；也有的问题先经他们讨论作出决议，后向党和政府建议。我们在和以伯厚先生为首的参政会相处中，特别重视听取他们批评，在这一点上是得到不少党外友人称赞的。除伯厚先生

之外，还有张人俊、夏从一、张青萍先生等，一向敢于坦率地提意见，有时还提得很尖锐。这对我们来说，至今仍铭记不忘。

一九四二年夏季来到了，敌伪对我们进行了三个月的大“清剿”，敌我力量对比有了较大变化，敌伪增加了近二十个据点，将整个县分割成好几个小块游击区和接敌区，县团只能在三、五平方里，至多是十余平方里之内活动。有时在宿营的村庄向四周瞭望，就能看见敌人的碉堡，甚至看到敌人的岗哨。就在这艰苦、严重的时刻，伯厚先生为我们开展敌伪工作，亲自奔赴泰兴城，向伪军和伪政府的一些头头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动员他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，要面白心红，向他们宣传新四军的抗战成就和决心，反复阐明得民者昌，失民者亡。针对他们把老中央（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）当作老正统，指出这是封建思想。新四军真心实意抗日，艰苦奋斗，不怕牺牲，为国为人民是深得民心的，总有一天广大人民会把他们选为正统的。他这一番话在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，县参政会驻委会在宣堡镇召开的扩大会上也一再讲过。他还公开指斥国民党

是假抗战、真反共，如不改弦易辙，必然逃不脱复灭的下场。他号召泰兴县各界人士和共产党、新四军协力同心抗战到底，为粉碎国民党的反共、分裂和投降政策作坚决的斗争。这些事实正好说明伯厚先生对我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与我们的关系也更为紧密了。

一九四三年中，苏中区党委和苏中行署提出大办冬学，以提高广大农民的政治和文化水平。苏中行署教育处长刘季平同志来三分区召开教育会议，作了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，提出教学内容以抗日民主为中心，在此基础上来提高教学质量。伯老对季平同志这一精彩报告十分赞赏。从此，他俩也结成为亲密的战友。自一九四四年春至一九四五年，伯厚先生任苏中三分区联合师范校长，常有机会见到季平同志。他参加苏中教育会议时，对新学制是有保留意见的。他认为新学制就战争情况来说，也许是适宜的。但他知道这是组织决定，就坚决执行，不仅口头上宣传，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大力贯彻，充分表现出伯厚先生的思想虽有保留，但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，不愧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本色。

自从伯老到苏中以后，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苏中党政机关和领导同志，开阔了他的眼界，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。从当时的形势来说，由于粟裕、叶飞二同志率领大军南下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特别是华东地区形势发展很快，需要更多的党员干部开发新区。我们的专员朱克靖同志几年来对伯老做了不少工作，在这时他奉命南下，就动员伯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为我党秘密党员。伯老为此曾三次来苏中党校找我谈心，一再说明自己还不够党员条件，仍愿以党外一名朋友的身份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。我三次劝他说，一个革命工作者应严格要求自己，经受严格锻炼，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革命任务，而入了党就可以得到党的帮助和教育，达到先锋战士的水平，就能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最后，他思想通了，请朱克靖同志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又要我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，我也答应了。

不久，他回到专署任专员，一定要我去当副专员，当我说明党员和一切革命工作者都要服从组织分配的意义后，他意识到这是个问

题，就未再拉我一起去三专署了。我在一专署工作开始的一段时期，即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一九四六年九月间，我们因工作上的关系还常通书信，有时托人捎口信，互通情况，直至一九四六年秋解放战争爆发，我们才失去了联系。后来，听说他年老体弱病逝了；又听说是被敌机轰炸而死的，（请县委查对一下）当时我只好默默地哀悼他。①

一九六一年春，我回到久别的泰兴县。江山换新貌，但已不见旧友。到烈士祠内也未见到伯老的名字。我当时向县委肖九成同志提议应该补上伯老的名字，还要补上泰兴党外同志英勇牺牲者的名字，九成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。②

我与伯老虽仅仅相处很短的几个年头，但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，尤其是他的政治态度，不断进步；思想水平，不断提高；对教学工作的态度，严肃认真，甚为感人。有几件事，至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。自一九四一年秋筹备泰兴乡村师范起，至一九四四年将泰兴乡师和泰兴高师合并为苏中三分区联合师范，他对校务非常负责，对教师教学，对学生学习，抓得

很紧，尤其对党员教师要求更严。师生回家如不做农活，他要给予尖锐的批评，说不劳动就会忘本。他自己那时虽已年迈，回家后仍坚持做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劳动。在生活方面，他自己一向是艰苦朴素，对大吃大喝的教师，对爱打扮、不专心学习的学生，也要进行批评。记得有一次发生了“雪花膏”事件，那是一位领导同志的女儿爱打扮，雪花膏搽得香喷喷的，伯老批评了她，这位女学生还有些不服气，适逢我有事去校部，伯老就征求我的意见，我支持伯老的作法，要教育她把精力转到学习上来，不学习，爱打扮，就要脱离群众。当时校部驻常家庄，距伪军据点只有三里路之遥。伪军经常到这个庄子里要钱、要粮、要草，有次竟走到教室旁边来了。伯老大嚷：这是学校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有些伪军士兵是认识甚至钦佩伯老的，听了这句话，也只好说：这是学校，我们走吧。这是伯老临危不惧的例子之一。一九四三年夏，胶东区教育处派代表来我泰兴考察，知道此一故事。对我说：你们这里只有敌据点，而无敌占区，你们的工作做到了据点的边沿，你们的学校办在据点的附近，